

双轴的耦合运转：论双轴的关系变化对姓名符号的动态影响

赵渭绒 杨昕怡

摘要：耦合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的紧密影响与互相配合的关系。在符号的双轴关系里，体现为双轴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方受到影响时，另外一方也会出现响应，双轴由此发生不同的运转。研究发现，姓名作为一种符号表意活动，其双轴的耦合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变化。组合轴与聚合轴的选择组合功能始终贯穿于姓名符号构成及表意的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运作状态及转向轨迹。本质上，这种不同代表了不同时代文化取向与价值判断的差异。双轴的耦合关系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更替而发生不同的运作及转向，并对姓名符号的编码历程产生动态影响，由此构成差异性的姓名符号。

关键词：姓名符号，耦合关系，双轴运作，双轴转向，社会与文化

Coupling Operation of Two Axes: Dynamic Impact of Shif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xes of Names

Zhao Weirong Yang Xinyi

Abstract: Coupling is a concept in physics that refers to the close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wo or more circuit components or electrical networks between their inputs and outputs. In the biaxial relationships of symbols, coupling is reflected in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xes: when one axis is affected, the other axis respond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operations of the two ax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upling of the two axes of the name as a semiotic activity has certain regular variations. The combined and aggregated axes are always functional in the process of the semiotic composition and ideation of the names, displaying different operational states and shifting trajectories. Essentially, these differences represent variations in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value judg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axes shifts and operates differently with chang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this has a dynamic impact on the encoding process of names, thus constituting different names.

Keywords: names, coupling relationship, biaxial operation, biaxial shift, society and culture

DOI: 10.13760/b.cnki.sam.202302018

一、研究缘起：姓名研究的符号学视角

作为人类特有的表意活动之一，姓名具有特定的指示与意义方式。“诚然，一个正式的姓名也是一个词，不过，它和其他用作姓名的词汇一样，与那些表示事物或概念的词是不同的。”(Derrida, 1995, p. 97) 这就是姓名的符号性质所在。姓名所使用的字词及其搭配会被

视为一种指称符号，会以另一种能够被充分理解的方式出现并使用，这种意义方式的共相，是姓名之所以为姓名的存在方式。

学界关于姓名的研究常围绕语言、行为、心理及文化这几个方面展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注意到了姓名的符号属性，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意识地将姓名视为一种符号进行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王建华在《人名文化新论》中明确指出姓名是符号化的系统；纳日碧力戈在《论姓名的显性意义与隐性意义》一文中引入了三对能指—所指关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姓名的显隐性意义进行阐述；贾布里勒·冯·布拉克与芭芭拉·博登霍恩主编的《名字与命名的人类学》一书对姓名的意义及所指展开了论述等。尽管学者们对姓名符号属性的论述由来已久，但多数研究的普遍倾向是将姓名视为笼统性概念上的文化符号或语言符号，并在传统文化或语言的理论语境下展开研究。因此关于姓名的符号学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符号学理论的应用研究在姓名符号整体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姓名符号的本体研究等方面都还有着一定的拓展空间。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任何符号活动都需要在双轴耦合运转的关系中展开。据此，本文将基于符号双轴这一理论，分析姓名符号在双轴不同运作状态下的构成及表意，并通过双轴的转向轨迹揭示耦合关系的变化对姓名符号的动态影响，以期对姓名的符号学研究有所补充。

二、编码原则：双轴耦合运转下的姓名符号

姓名的形式组合与意义解释都离不开符号双轴的耦合运作。所谓耦合运作，即组合轴与聚合轴共同作用，当其中一方受到影响时，另外一方也会出现响应和改变，由此建构起姓名符号的意义生成活动。聚合轴作为姓名构成的深层结构，与符号所处的社会文化场相连接。它不显现于表层，同时为姓名的组合提供多种可能，姓名最终则以组合的形式进行呈现。

在命名过程中，耦合运作同时进行，姓名需要选择字符进行组合，选择的同时便需要考虑新的组合是否能实现心理期待中的表意。该行为与命名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符号的组合规定与指称意义都包含于社群组织的逻辑之中。因此，双轴耦合运作的逻辑根植于所处社群的文化运行逻辑之中。尽管双轴是同时运作的，但聚合段上的选择行为会在逻辑上先于组合行为。组合作为聚合的投影，并不会让聚合轴所提供的成分全部都显现于社会表层可见的运行体系之中。这种逻辑上的限制关系再加上二者同时耦合运作的特性，就使得双轴的运作状态不会一直维持在相互对等作用的状态中。当一方受到影响时，另一方并不会发生同等的响应变化，双轴的运作状态便因此发生动态变化。不同时代的文化取向与价值判断会促使双轴的耦合关系发现偏移与改动，由此形成不同的耦合运转状态。

综上，从宏观上来看，姓名符号作为始终处于双轴的耦合运转关系之中的表意活动，便会持续受到相应的动态影响。具体而言，在不同时代，姓名符号会随着社会变迁及文化更替而出现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双轴在各阶段耦合运转的不同显性表现。

三、动态影响：双轴运转下姓名符号的演变路径

（一）深度的运作：聚合轴主导运作的耦合阶段

聚合轴的深度运作、组合轴上的有限选择是这一阶段符号双轴的耦合关系。这一阶段，人类认识与适应世界的方式是简单而直接的，原始自然的状态是当时文化与价值形成的准绳。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综合形态提供了具有相应特征的运作结构：“在创造神话的那个时代，每个词，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都有其充分的原生功用，每个词都是笨重和复杂的，它们的内涵非常丰富，远远超出它们所应所说的东西。”（缪勒，1989，p. 68）受此影响，双轴的耦合运作状态会偏向于聚合轴，聚合轴进行深度运作。而作为耦合关系的另一端，组合轴进行了相应的变动，其运作力度减弱，体现为组合段上的有限选择，以契合该阶段的社会及文化状况。

在这一阶段，人们的取名方式较为直接质朴，而与此相对，命名选择的字词则是复杂而有深度。例如，根据范玉梅（1992，pp. 108-109）的研究，东北赫哲族的图腾崇拜与狩猎经济密切相关，与此相关图腾不仅是本氏族的标志，也是该氏族成员的姓，例如朝日朝恩克哈拉意为黄鼠狼氏族、孙木恩哈拉意为独角龙氏族等。可见，这些命名活动的组合选择实际上都与社群生存的文化思维密切相连，他们倾向于以文化思想上的崇拜和认知来主导行为活动，社群命名时的形式组合也依赖于此。聚合轴所提供的有限选择并不影响他们的命名，他们更加重视利用聚合轴的深度运作为自己的命名活动赋予文化标志，以此强调来源的重要性与神圣性。因而，双轴的耦合关系更偏向于聚合轴的主导运作。

不仅如此，意义的解释也与该社群的生活与文化密切相关。换言之，比起多样性的字词选择，人们命名时更加重视字词本身的意义。概括来看，这一阶段的姓名作为一个社群习俗禁忌、神话传说、生产生活等方面聚合起来的综合物，有着特定意指含义的解释规则。不同社群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对应事物一定的意义，也会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根据社群及认知的发展而进行改变。在这一层面上，与社会文化场相连的聚合轴得以进行深度运作，主导了对姓名的解释活动。以苏人部落中“卡克乌阿母梯瓦”一词为例，列维-斯特劳斯（2006，p. 191）指出，该词可以指盛开的烟草花，也可以表示一般的植物发芽或者代表光茎飞燕草花，而使用哪一个意义进行命名则根据命名者所属的氏族而定。词语的所指含义由社群相应

的人员负责进行解释与传递，这直指命名活动的聚合轴。比起多样的选择，他们更重视意义的传承与使用。可见，组合轴上的有限选择数量与聚合轴的深度结构相呼应，并始终紧密地与社群的组织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相联系。

不过，这一时期的姓与名、单名与群名的区分界限是模糊的。姓和名均作为社群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以一种通指的形式而出现，用以区分不同的社群。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以社群为主的交往活动等因素使得个人的区分远不如群体之间的区分重要，所在的社群对他们来说才是一种界限。因此，姓和名不仅是社群成员的代指通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该社群的标志而存在。因而，与社会文化场相联系的聚合轴得以进行深度运作，因为它涉及到关键的区分功能。

如上所述，双轴进行这样的耦合运作是“万物有灵”文化在姓名符号编码上的一种表现，以此从命名角度反映人们对世界简单而朴素的生存观。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自己与周围自然界的动植物或非自然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社群的起源、生产、发展都与其密切相关，对它们的重视程度就使得与社群文化场相连接的聚合轴会进行纵向的深度运作。表现在命名活动上，就是聚合轴以深度的方式主导了双轴关系，从而将命名活动的各方面与社群生活的各方面紧密联系，每一个名字都会有着详尽的来源和解释，尽管可能在组合上会以有限而重复的形态出现。

总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双轴的耦合运作更多依赖于聚合轴的主导作用，这是聚合轴受到该阶段社会状况及文化思维的影响的体现。因而，组合轴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动，以有限的选择来更加凸显聚合轴的主导地位。姓名符号的构成便受此影响，姓和名的来源与解释均具有深度，即结合该社群的社会综合形态去分析构成原因与意指含义。

（二）选择与制衡：双轴运作相对平衡的耦合阶段

随着社会演进与文化进步的影响，作为符号背后运作的双轴，便在这种发展中发生了新的转向。聚合轴由纵向的深度运作逐渐转向横向幅度的拓宽运动，人们在进行命名的时候会感受到背后聚合轴的幅度在逐渐变宽。与之相对应，当姓名组合选择的可能性增多，社会便需要形成相应的姓名规则。组合轴受选择规则的影响，运作力度得以加大，对聚合轴发生反作用，聚合轴便发生相应的改变，不会再继续拓宽幅度。在这样的运作方式下，双轴的耦合关系也逐渐达成相对平衡的状态。

作为一种双轴交互作用的符号系统，姓名的使用是代代相传的，它涉及的历史记忆及社会文化因素是代代积累的。因此，聚合轴提供的选择幅度会逐渐变宽，这是历史文化及社会

存在的发展所致。“历史文化”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文学作品、历史传说、民族交流等因素均会作为社会的深层结构影响着聚合轴的构成，从而为聚合轴的拓宽提供可能。以中国汉族的姓名为例，一方面，从姓的发展上来看，姓的来源和数量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而逐渐增多。根据李锡厚（1992，pp. 40-42）的观点，周代，通常以国名、谥号、官职等为姓和氏。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动、汉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姓氏也逐渐合一。这时除了国名、谥号等为姓氏的传统来源，郡国、邑、乡、亭、地等都可以作为姓氏。就这样，姓的来源及负载的意义便逐步积累、丰富起来，聚合轴的选择幅度便逐渐拓宽。另一方面，中国汉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主导的取名文化风格，上一时期命名的风格与方式会被之后的人们纳入命名参考的范围，而同时会结合当时主导的命名倾向，并再次延传下去。例如周秦时流行五行命名的风俗，而至宋代，“考宋人也有以五行命名的风尚，却不根据八字欠缺，而取五行相生之义，用以序辈。”（萧遥天，2007，p. 89）。由此可见，这种延传的方式就使得聚合轴能够提供的选择日益增多，人们命名时的选择面便逐渐拓宽。

“社会存在”则指向人们的生产生活。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扩大与文化语言水平的提升，生态环境、生活地域、社会职业等社会存在的各方面都可以成为姓名选用的来源，同时代表它们的词汇又日益发展丰富并且成为聚合轴提供选择的重要构成部分。例如在英国，“当地姓名的来源可能从一个国家到一种植物，比如 France、Darbishire、Lankester、Ashby、Street、House、Pound、Plumptre、Daisy 等……”（Weekly，1914，p. 97）郭民（1987，pp. 243-244）指出，在阿尔巴尼亚，有的姓来源于地名，如 Tomorri 来源于托莫里山、Vreshta 来源于葡萄园；有的则来源于职业，如 Bozaxhiu 来源于职业做黄酒的人。总而言之，这些被视为姓名意义的词汇同样会被固定、继承、沿用下来，并随着因人类认知水平提升而出现的新的姓名词汇一同被纳入聚合轴所提供的选择之内。

但是，这一阶段的姓名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命名的权力是复杂征服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抵抗和重建正统的一部分。”（Bodenhorn，2006，p. 141）因此，当选择的层面得到扩大之后，出于管理和统治的需要，形式需要被确定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行规则。姓名在这一阶段会被彻底纳入社会管理制度中进行规范，与权力结构交织，对命名活动产生约束。这种人为建构的社会规则作为话语主导者，引导着人们的命名活动。组合轴因控制规则的形成便会对聚合轴的运作产生明显的影响，这就使得聚合轴不仅不会无限拓宽，还会逐渐失去上一阶段的主导地位，双轴的耦合关系通过这样的运作达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这种相互制衡的耦合关系便主要表现在选词用字方面。在字词的选择上，人们也并不能

任意选用聚合轴所提供的所有选择,也不是所有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存在因素都会被纳入聚合轴之中。一方面,姓的选用呈现出较为固定的状态。这一阶段,姓所代表的是贵族身份与阶级地位,不能由单独的个体任意决定,而一旦确定,姓便会一直继承使用。家族身份、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意识使得人们尤为重视姓的继承,而阶级统治使得平民百姓通常无权取姓,姓的使用范围也体现出鲜明的阶级色彩。在这一层面上,姓在组合段上受到约束,聚合段便做出相应的改变,选择幅度便停止拓宽。另一方面,宗教、教育、身份使得名的选用得到了各种限制。在阿富汗,人们命名选词时会因宗教而受限。在封建时代的中国,避讳的传统及鲜明的阶级区分使得平民和统治者会陷入相似的局限之中。因此,尽管历史文化及社会存在的因素逐渐增多,但组合段受到了明显的规则约束,这就使得聚合轴的运作得到了相应的限制。总之,历史文化及社会存在的因素因此不会都被纳入相关场域为组合轴提供选择,双轴之间的耦合运作并非因为社会进步与文化提升而变得自由多样,反而会处于设立好的规则范围内。

概而言之,当聚合轴逐渐达到一个相对宽幅状态的同时,组合轴上的姓名组合会因避免多样造成的无序后受到管理规则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制约的状态下,双轴便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耦合关系,聚合轴的多种选择与组合轴的多样组合、选择使用上的限制与形式组合上的规定会互为对照、共同作用。

(三) 自由与追求: 组合轴主导运作的耦合阶段

社会的逐渐开放与文化的丰富多元,促使双轴再次发生了新的运转,形成了新的耦合关系。随着规约性的减小与命名自由度的加强,双轴的运作逐渐偏向于组合轴的自由运作,组合轴成为了双轴耦合关系中的主导者;聚合轴则受到这种“自由”的干扰,在运作力度逐渐减弱。

伴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命名活动已逐渐随着规则的打破而“祛魅”。首先,姓得到了广泛地使用。例如在泰国,“……国王便于1912年3月22日颁布《用姓条例》。该条例于次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从此泰国人才开始用姓。”(陈健民,林谦,1987,pp.87-88)。法律的规定促进了姓的普及化及个体化使用,并且让人们将对“姓”的理解与姓名法律及个人家庭方面相联系。因而,姓的使用意义逐渐占据人们视野,姓在之前标志地位和身份的作用则慢慢淡出人们视野,成为一种历史性理解的概念。其次,名选用的自由性大大增强。例如,“独立后,菲律宾人在取名方面比较自由,不再严格地按照排在日历上的教名来取名了。”“有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或熟悉的历史人物直接给自己取名。”(斐玉珠,1987,pp.124-125)。

这种自由组合的行为使得联系聚合轴进行解释的行为力度被大大削弱。自由度的逐渐扩大会使得人们逐渐不关心姓名符号原本的经典意义，“这些隐喻一旦被忘记，或者后来词汇赖以派生的词根原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整改变了，那么这些词当中自然会有许多失去其诗情画意、及其根本的原意。”（缪勒，1989，p. 76）例如在法国，“不少家长为女孩子取名安蒂娅（Antia），这个名来自俄语，法国人借用它，只是因为它读音悦耳。”（齐平景，1987，p. 390）相反，则很少有人去探查其含义。同时，随着姓得以被充分广泛使用，人们更多将其视为一种法律上必须存在的组合构件，姓的继承性与法律性便削弱了人们联系聚合轴的行为，姓作为结构之一的使用意义远远超出其历史文化上所拥有的经典含义。

事实上，在这一阶段，这些处于聚合轴上供以姓名组合选择的字词，“它们的指称是由一根因果的（历史的）链条而确定的，而不是由任何词项的用法决定的。”（克里普克，2005，p. 125）也就是说，之前姓名的意义指称一环一环地传递至这一阶段，所代表的意义是“多种语义的历史集合”（俞建章，叶舒宪，1988，p. 234），容易被瞬间呈现和理解，意义探查的维度大大减小。这便使得一系列紧密相关的文化历史解释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些解释与生活运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预示着双轴关系里组合轴逐渐主导的运作趋向。意义被呈现和理解后，人们会针对姓名的意义开始进行“反陌生化”的操作，聚合轴深度运作的功能逐渐被隐蔽，这种观念便加剧了组合轴上的连接操作。姓的相关性质使得人们不再关注姓的历史意义及文化作用，而是直接进行使用；因而，人们致力于在名的方面进行组合变化，试图通过组合来达成期待的效果。例如，中国公安部发布的《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在2010-2019年间，女性使用最多的10个名字分别为：欣怡、梓涵、诗涵、梓萱、子涵、紫涵、佳怡、雨涵、雨欣、一诺。在这其中，使用“怡”“梓”“涵”等字及其变体进行姓名组合的较多。实际上，从姓名符号发展的总体历程来看，这一阶段用组合轴主导运作下的姓名符号文本成为了一种“刺点”：它“或多或少地潜藏这一种扩展的力量。”（巴尔特，2011，p. 59）它“就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赵毅衡，2016，p. 165）于是人们通过狂欢化的组合彰显让人激动的断裂感，以表达自由和狂喜，毕竟“文化的偏纵聚合运行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徐亮，2007，p. 13）人们并非失去了意义寻找的主观能动性，只是追求的意义不再是常规观念中的经典意义。用组合轴主导姓名符号及其编码方式，实则是从命名角度为快速更替的潮流文化导致的焦虑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即跟随日益增长的流量主义与更迭迅速的媒体主流进行选择。不过，这种因社会风潮而形成的追求，反而成为了一种与聚合轴相联系的表现，与意义相关的经典变为了通俗。与其说聚合轴的地位和功能被隐蔽了，反而不如说聚合轴之前的功能被隐蔽了，聚合轴在这种社会特性的影响下实际上趋向了一种简单

化、通俗化的运作。

这一阶段双轴的耦合关系可以看作是詹姆斯认为的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性回归的潮流体现之一。“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是现代的，它戏剧地展示了自身的主张。”（詹姆斯，2009，p. 26）而姓名符号作为一种自我指涉的能指，它的目的是指涉自我的存在、显示自身的主张。但“……无论用什么样的修辞，它都无法从‘新’的安排中彻底消除这些范畴……因此，新的对差异的崇拜仍然与先前的‘新’相交叉……”（p. 4）因而，符号背后的双轴的改变始终会包含着之前的内容。与聚合轴相联系的意义始终是由之前的理解及指涉而形成的，只不过发展至这一阶段便逐渐与形式相连，原先被视为经典的意义成为了形式本身。聚合轴便逐渐与较为新生的、通俗的意义场相连接，因此会让位于组合轴上的狂欢组合，从而造就了组合轴主导姓名符号双轴运作的现象。

可见，在这一时期的耦合关系里，组合轴被刻意视为双轴运作关键对象，并且在组合轴的领域内，“作为集体习惯标志的语言事实和决定于个人自由的言语事实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索绪尔，2017，p. 169）聚合轴的地位和功能因此进行了响应调整，与聚合轴运作相联系的场域变得大众化了。这逐渐走向了另一种模式：姓名和其意义总是平等地呈现在组合的空间里，它与当下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以各种可能的线性形式呈现，而不通过纵向的方式呈现。与此同时，这种命名的组合方式却成为了新的一种意义，一种由民众自发趋向构成的意义，反映的是这一阶段姓名符号意义自由性与大众性。

（四）回归与多样：双轴再次趋向平衡的耦合阶段

伴随着社会管理秩序的进步、文化理性思维的回归，双轴的耦合关系再次发生了新的运转：聚合轴转向有深度、有宽度的运作；与之相配合，组合轴上的纯然操作得到了限制，但并未通过规则反过来进行约束。在这样的运作方式下，聚合轴中的选择可能被充分展示到了组合轴，这种对等结构形成了平衡的耦合关系。

姓名符号的所指意义，“它所表明的是一个符号体同它以外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俞建章，叶舒宪，1988，p. 232）这就表明，姓名始终处于社会的运转体系之内，而人们作为在社会上生活的“人”，离不开身份确立这一问题：“没有姓名、语言和文化，我们就不会了解一个人，因为自我与他者、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在姓名、语言和文化之中形成的。”

（Calhoun，1994，p. 9）因而，在这一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姓名及其意义的重要性，而聚合轴作为传达意义感知的重要部分，便因此得以进行深度运作。与此同时，原先组合轴上纯然自由的操作也进行了相应的收敛。事实上，命名活动始终会受到命名法规及命名文化习惯

的影响，它们通常随着聚合轴的形成一起隐身，在组合上常表现为姓名的自由选择。在这一阶段，随着自我身份确立及认同需求的增加，聚合轴得以进行深度运作。它们因此被拉入至意识层面，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塑造力量，有意识地重新整理更新组合段上的组合选择，以适应调整运作后的聚合轴。

就身份的确立及认同而言，根据赵毅衡（2016，p. 341）的观点，需要经历范畴化、比较、认同三个步骤。人们首先通过“范畴化”确立自己的定位标签，即姓名符号所代表的自我属于什么身份，如何区分他们和自我；其次，通过比较与归属划分，确立这个自我属于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具体而言，在姓的使用方面，人们更为关注姓所表示的国家民族文化，从而将个体与国家民族相连，彰显归属感的同时确立自我身份标签。比如，“我们还可以从外国人姓的结尾或后缀看出其民族属性，例如 i 是意大利人姓的结尾，oglu 是土耳其人姓的结尾；poulos 是希腊人姓的后缀；ez 是西班牙人姓的后缀；ian 是亚美尼亚人姓的后缀；ski 是波兰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姓的后缀，等等。”（张联芳，1987，p. 488）从取名方面来看，人们取名时会偏向于使用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字词。比如，中国《二〇二一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与 2020 年相比，“汐”“芮”“霖”“航”等字受到了青睐，这些字与之前“泽”、“梓”等字一样，都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征与民族属性。归根结底，这种进行范畴化比较并进行身份确立归属的操作背后，是聚合轴的深度运作。聚合轴与历史、文化联系的特质再度得到重视，并得以深度运作，以帮助人们进行自我定位及归属的确认。至此，组合建构起来的姓名符号便能“使我们能够从乍一看似乎只是文化差异的东西中看到模式。”（Bruck & Bodenhorn, 2006, p. 2)

此外，在这一阶段开放多元的时代，社会文化与人们的认知水平再次得到了提升，经典与新生的意义则共同处于为聚合轴上可供选择的范畴，并扩大投射至以组合为轴心的组合活动中。一方面，姓在意义及使用方面得到了重视与扩充。例如在中国，“取双姓”成为了一种较为流行的行为。这显示出了对姓的重新重视，同时“又对母亲的姓氏给予足够的尊重，符合我国文化中尊敬长辈的传统。”（王建华，2010，p. 289）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常用人名，人们会结合更新后的文化，给予其更为扩展的概念。例如，姚青山和李世骏（1987，p. 289）指出，在俄罗斯，薇拉的原意为信念、信心、信仰，现在也有了“长久”之义。可见，聚合轴同时向纵向、横向进行深度运作。同时，有别于过多的规则限制，在这一阶段，命名规范的遵从与文化习惯的保留主要是出于管理方便和身份认同的需要，而非强制实行压抑个人意志的统治。因而，在聚合轴深度运作前提下，人们依旧保有自由组合与自由选择的权利，双轴的耦合关系就在这样的运作方式下趋于平衡。

综上所述,在这个阶段,命名的理性再次被召回,姓名才真正开始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象征着意义探寻的回归。此时双轴的耦合运转包容平等地叙述了有关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个人爱好的内容,并在时空上都脱离了它们原来的语境,创造了一种既需要意义填充、又预示着组合得以无限可能的自由性。由此,这一阶段的双轴在耦合关系上达成了一种殊途同归式的平衡状态,并对姓名符号产生新的影响:重新正视姓名意义表达的重要性,历史文化与社会存在作为当代姓名中的塑造力量,同时将其表示为纵向探寻与自由组合,意义通过组合显现,而这离不开需要聚合轴的深度运作。

四、结语:双轴的关系变化对姓名符号的动态影响

本质上,双轴的耦合运转会将社会与文化上的各类信息分解成空间化的排列形式,为不同文化语境下姓名符号的展示和理解提供可能性。组合轴与聚合轴作为姓名符号意义耦合展现的两个向度,会持续不断地对姓名符号的编码历程产生动态影响,这体现了双轴运转对姓名符号的持久关注。从遵循二元模式的传统规律运作,到试图打破所有桎梏的自由组合,再到既向外发展又关注内里的过程,总之,双轴就通过不间断的耦合运转将姓名与社会文化相结合,以此来阐述社会变迁及文化更替对姓名符号编码过程的影响。而随着生活体验的不断发展,双轴会以一种不断运转的耦合方式去接纳因社会时代变化而发生的种种改变,进而以小见大地表达社会、历史、文化、思潮、风尚等方面已更新的信息。姓名符号就这样处于双轴耦合运转的语境中,并持续受其影响不断进行着改变与更新。

引用文献:

- 巴尔特,罗兰(2011). 明室:摄影札记(赵克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健民,林谦(1987). 泰国人的姓名. 载于张联芳(主编) 外国人的姓名, 86-9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范玉梅(1992). 赫哲族. 载于张联芳(主编) 中国人的姓名, 107-11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斐玉珠(1987). 菲律宾人的姓名. 载于张联芳(主编) 外国人的姓名, 116-125.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郭民(1987). 阿尔巴尼亚人的姓名. 载于张联芳(主编) 外国人的姓名, 243-250.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列维-斯特劳斯, 克洛德(2006). 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锡厚(1992). 汉族. 载于张联芳(主编) 中国人的姓名, 37-78.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缪勒, 麦克斯(1989). 比较神话学(金泽,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克里普克, 索尔(2005). 命名与必然性(梅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齐平景(1987). 法国人的姓名. 载于张联芳(主编) 外国人的姓名, 383-394.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索绪尔, 费尔迪南(2017).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萧遥天(2007). 中国人名研究.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 王建华(2010). 人名文化新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亮(2007). 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对赵毅衡教授“符号灾变论”的一种回应. 文艺研究, 12, 11-15.
- 俞建章, 叶舒宪(1988). 符号: 语言与艺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姚青山, 李世骏(1987). 俄罗斯人的姓名. 载于张联芳(主编) 外国人的姓名, 278-299.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联芳(1987). 关于姓名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载于张联芳(主编) 外国人的姓名, 454-490.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2009). 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 王丽亚,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21-02-08). 《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发布. 获取自 <https://www.mps.gov.cn/n2254314/n6409334/c7726021/content.html>.
- 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22-01-24). 《二〇二一年全国姓名报告》发布. 获取自 <https://app.mps.gov.cn/gdnps/pc/content.jsp?id=8349293>.
- Bodenhorn, B. (2006). Calling into Being: Naming and Speaking Names on Alaska's North Slope. In Gabriele vom Bruck & Barbara Bodenhorn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139-1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uck, G., & Bodenhorn, B. (2006). "Entangled in His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In Gabriele vom Bruck & Barbara Bodenhorn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1-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houn, C.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9-36,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 Derrida, J. (1995). *On the name*.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ekly, E. (1914). *The romance of name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作者简介:

赵渭绒, 博士,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杨昕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

学。

Authors:

Zhao Weirong, Ph.D,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zhaoweirong2005@163.com

Yang Xinyi,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mail: wanyang9671@163.com